

## 人与疫病的博弈

陈 飏

黑死病、天花、西班牙流感感……这些传染病曾经是人类的梦魇。惊惶之余,出于求生的本能,人类也与传染病展开了不懈的较量。人类最终知道传染病是怎么回事,只有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教授告诉本刊记者:18世纪以前,西方医学上治疗疾病的方法采取的是根据体液学说平衡的原理,即疾病为体液失衡,治疗用催吐、放血、催泻等方式达到平衡,但经常无效。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细菌学说,与此同时,药理学也随之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不再束手无策。

### 公共卫生体系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发展最迅速的100年,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成功地控制了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疫苗的研制和计划免疫工作的开展,也使人类摆脱了许多传染病的纠缠,“预防胜于治疗”的意识开始在人们的脑海中扎根。此外,传染病也催生了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黄建始说,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最早源于黑死病。此后,由于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资本家便去农村招募工人,群居生活的工人们很容易染上传染病。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人类开发出洗手、清洁垃圾、安全用水、消毒、隔离传染病病人等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另外,为了海外殖民,使士兵拥有健康合

格的体魄,政府开始出钱给穷人的孩子喝牛奶;建立妇幼保健所,免费给穷人妈妈做检查,让她们能生出健康的孩子。这样的强国政策也促成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全民爱卫生、除四害等运动的开展,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开始初步建立。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一直不很完善。“2003年SARS”唤醒了中国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卫生部陈竺部长就曾对我说过,“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SARS之后的几年,我们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建设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在硬件上,我国的传染病监测和网络直报系统已经是全世界最大、最快的了,但我们人员素质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基层人员的系统培训还不够。”黄建始说。

### 科学之道

进入21世纪以来,疯牛病、口蹄疫、SARS和禽流感频发。黄建始认为,这主要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1968年,中国只有500多万头猪与1亿多只鸡鸭,但是现在至少有1亿多头猪与130多亿只鸡鸭,病毒发生变异并传染人的机会大大增加。再加上交通的便利,造成了传播速度的加快,而且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在黄建始看来,影响传染病发生的因素,除微生物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比如人口的流动、战争、滥用抗菌

素、医疗水平等。“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微生物,认识传染病。”黄建始告诉本刊记者,他去年参加瑞典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主持人的开场白是:“我们人是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喜欢我们,我们就活下去了;微生物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杀死。”据统计,人类身上有1亿亿个细胞,有10亿亿个微生物。微生物没有人类可以生存,但人类没有微生物就无法存活。比如人类如果没有大肠杆菌,就不能吸收维生素K,便会出血而亡。

“人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生物,他侵犯了很多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在农牧业社会以前,人是很少得传染病的。但到了农牧业社会,人开始定居,就有了垃圾,开始污染环境;人们把动物圈养起来,人与家禽畜畜接触的机会多了,人、动物与微生物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

在黄建始看来,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斗争是不现实的行为。因为到目前为止,控制传染最有效的武器是疫苗,但是要制造有效、安全、数量足够的疫苗,并将疫苗在特定时间内运到使用地,接种到需要的人身上,难度相当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100%有效的疫苗。疫苗不是万能的。1976年美国爆发流感,4000万人注射了疫苗,结果在500多人身上发生了副作用,得了格林-巴雷氏综合征,是

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其次,就如一位加拿大专家所言,就算开动全国的机器生产疫苗满足全国2000万人的需求,花去的时间至少也要6个月,但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只需1个月就快速扩散了。另外,所有疫苗必须在低温下才能有效,中国幅员辽阔,运输便成了最大的问题。控制传染病符合“木桶原则”,保护所有人不受感染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一旦没有足够数量的疫苗,没有接种到足够的人身上,就不能真正控制了传染病。

另外,在药物上,很多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病毒很狡猾,一旦我们大面积使用药物,病毒便会察觉而产生耐药性。一旦病毒产生了耐药性,药就失效了。”由此可见,单纯依赖疫苗、药物控制传染病是不理智的。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来控制传染病,即采用传统公共卫生的方法来应对传染病,通过改变传播传染病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因此,人类不仅要和谐地和自然相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健康,采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和微生物相处的科学之道。尊重自然,利用现代化好的东西,剔除现代化坏的东西。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少喝酒,少抽烟,多运动……最重要的,还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摘自《人民画报》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bwh1616@sina.com

## 温总理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

担任总理职务半年后,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讲了一直放心不下的三件小事:

第一件事,1993年7月4日,我到山西省吕梁山区临县的一个村里去考察。那天下着大雨,到了一所小学。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窑洞,只有十多套破旧的桌椅,五个年级的同学混班上课,学生面朝里,光线很暗。这一幕情景我一直不能忘怀。我有几年没去临县

了,不知这个窑洞学校还在吗?那里的孩子现在上学条件怎么样?我放心不下。

第二件事,1995年6月11日,我到甘肃省靖远县,那是一个贫困村。我走到一户农家,主妇双目失明,丈夫是个痴呆人。她身边有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位主妇拉着我哭个不停。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学,上希望

小学。我瞎了一辈子,就希望孩子能上学,不当睁眼瞎。”她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对社会的进步很有眼光。她希望下一代能够上学,就是希望摆脱长期的贫困、愚昧、落后。

第三件事,2002年陕西秦岭发大水,6月25日我赶到佛坪县的沙坝村,那里灾情很重,连整个县城都被淹没了,唯独学校还有朗朗的读书声。这是灾后那里唯一幸存的学校,老师在带着孩子们上课。有的孩子已

成了孤儿,他们的父母在灾害中遇难了。我到教室看望师生,领着孩子们大声朗读了黑板上写着的几句话: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要克服重重困难,为重建我的家园而努力。”

有了“穷人经济学”的言说,便有了免除农业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行动;有了“穷人教育学”的理念,便有了对教育产业化的纠偏。具体措施不一而足,成效也有待检验,但那些“故事”浮出水面,甚至开始被社会主流频繁讲述,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 姜昆搞笑陷阱

速之客”,接着报幕员的说:“今天真是‘乐在其中’,您听听它还‘呱呱’叫吧!”

姜昆的这个“现挂”,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台下一片笑声。他接着找鹦鹉,说:“哪去了?那只鹦鹉哪去了?今天,我特别高兴,有幸还能和鹦鹉同台演出。”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捧哏”的戴志诚马上接过去说:“刚才,报幕员报错了,这个节目应该是三人相声,除我们俩外,还有一个鹦鹉呢。”

说来也怪,这只鹦鹉可能“自感羞愧”,在台下掌声和笑声中向后台飞去。姜、戴二人也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了《乐在其中》的表演。

这时,姜昆和戴志诚想,舞台上人多了,鹦鹉也许就下去了。所以,还没报幕员的掌声走到舞台当中。这只鹦鹉就像要和姜昆争夺舞台一样,不但不上台去,反倒伴着观众的掌声在舞台上空盘旋起来。没办法,报幕员只能接着报:“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乐在其中》。”

走,前面很顺利,三个人都被“变”走。舞台上只剩一个戴志诚。按照节目的安排,姜昆走上台来问小戴:“哎,那三个人儿都上哪去了?”小戴回答:“都变走了。”

“不能没,那么大的人一下子变没了?”

“这有什么,我也能变走。”

“你这是吹牛,我怎么看你走?”

“不信您瞧着!”

姜昆一扭脸,小戴真的不见了。姜昆四处寻找说:“小戴哪儿去了?”然后对观众说:“您看,好好的四个大活人都哪儿去了呢?”演到这儿,魔术师从台下空盘旋上来的节目。

导演只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向姜昆作了交代,并没向姜昆说明魔术机关,事前也没有排练。

在演出现场,当小戴“变”走以后,姜昆还站在台子上,他真不知道小戴是怎么“变”走的,也不知道台子的后半截是用布糊的。

这可把姜昆闹惨了,他仍没忘了演出,一只手还紧紧握着话筒。戴志诚的反应是:“坏了,这节目演砸了,整个穿帮了,这底下没戏进行。”

观众不明白这是失误还是节目的安排,可舞台上的导演和工作人员知道啊,他们开不得都喊出了声,既担心摔伤姜昆,又担心节目没戏收场。

让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是,姜昆没有顾及已被摔伤的胳膊,脸上也没有疼痛的苦相,而是从夹层中现出惊喜的笑容,冲着观众喊了一声:“原来,他们还在!”

台下的观众炸了锅似的大笑。太真实啦!他们看见姜昆露出来的半个脑袋和一个话筒,还以为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结束的。

姜昆的一个“现挂”,化解了一次舞台事故,赢得满堂彩。然后,他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接着说:“他们还想像我?我是谁呀!对吧?”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他报完幕后走到后台,一个劲儿地捂着胳膊在咧嘴。大家都关心地围上来。这时,姜昆还“现挂”呢:“导演,我这可是工伤啊!”有的演员是眼里含着泪花在笑。

他还说呢:“说相声在台子上还能受‘工伤’,还让人给折腾到陷阱里去。我在台上摔伤了还得了,太危险啦!”

摘自《不用偷着乐》

公司保卫科有甲、乙、丙三个人。老科长退休了,要从他们当中提拔一个做科长。

那天,发生了一起火灾,由于保卫人员及时有效的措施,并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多的损失。老板事后进行了论功行赏,并宣布有关任命。

甲奋不顾身,带人抢出了公司的重要资料和物资,头发都被火燎了。

## 提拔没功劳的人

乙及时开了消防栓灭火,并且报了火警,衣服都破了。老总说他们是好样的,要全体员工向他们学习,奖了甲100元钱,奖了乙800元钱。可出人意料的是老总竟然宣布丙做保卫科科长。当时丙待在家里,毫发未损。众人不解,为什么要提拔丙做科

长呢?老板说:“因为他和我吵了一架,生气了才待在家里的。”

众人更是一头雾水,他目无纪律,目无领导,那更不能提拔啊!

面对众人的疑惑,老板抿了一口茶,缓缓地說道:“那天,他找到我反映公司的消防有隐患,要立

即整改,我说公司里正忙着,等这阵子忙过再说吧,他生气了,然后就撂了担子。试想,假如我当时听他的,就不会有这场火灾,就会没有一点损失,你们说他的功劳是不是最大的?”

众人都明白了,老板看中的是丙对工作的责任心,而不是甲、乙在事故发生后的表现。

摘自《财富人物》

## 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的关系

象棋的发明,可能是在南北朝。起初被称为“象戏”,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学者慎慎认为“象戏”是取象于日月星辰的。它演化成后世的象棋是印度人加工的结果。北朝“象戏”有象征日月的棋子,也有类似现代中国象棋“将”、“帅”的棋子;五代、北宋出现的“炮”,最初是表示飘忽不定的彗星的棋子。这种棋戏传入印度后,在约七世纪时(中国初唐时期)演变成战争游戏。“象”、“马”、“车”、“兵”四种棋子,是当时印度军队的组成部分。经过印度人改造的象棋一面传回中国,一面经波斯、阿拉伯传入欧洲,衍生出中国和西方两大象棋体系。

唐代象棋,已经接近现代象棋的形态;到了北宋,规制多变;南宋以后,逐渐定型,此时的象棋已离最初的日月星辰之象越来越远。但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人似乎没有忘记它的天文学含义,都把象棋用于占星术。虽然两个象棋体系在后世的发展中有了很多差异,但其同出一源的标志还是很明显的:兵进不退、马走日、象斜行、将帅或王一步一格

林庚: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丁肇中:做科学,我不知道第二名是什么感觉。  
徐悲鸿: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论。  
陈省身:数学没有诺贝儿奖是一件幸事。

## 中国文化的趣味问题

等都是它们的共同点。可以说,国际象棋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智慧。

### 古人一直都是用筷子吃饭的吗

《礼记·曲礼上》讲到请客吃饭时,说:“共饭不泽手。”“泽手”就是双手摩擦发热而出汗的意思。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的注解是:“古之礼,饭不用箸(筷子),但(只)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絮(洁)净,不得临时始搽莎(两手相搓)手乃食,恐为人秽也。”原来上古时的中国人和现代阿拉伯人一样,是吃“手抓饭”的,并不是用筷子作为餐具的。

吃手抓饭,使古人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管子·弟子职》说:“先生将食,弟子饬饬,摄衽(衣袖)盥(洗手)漱,跪坐而饬。”意思是:先生要吃饭了,弟子要准备好食物,然后洗手漱口,跪坐着吃。

### 阿谀奉承为何也叫“拍马屁”

关于“拍马屁”的来历,还真有几种有趣的说法,都与蒙古人的习俗有关。一是说蒙古人有个习

惯,当两人牵马相遇时,应该在对方马的屁股上轻拍一下,以示尊敬;二是当蒙古族骑手遇到难以驯服的烈性马时,就会拍拍马的屁股,这样马会感到舒服,骑手即可乘机跃身上马;三是蒙古人爱马,如果马肥壮结实,两股必然隆起,所以见到骏马,蒙古人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由此可见,这个词本来并无贬义。然而,这些礼节和习俗却成了趋炎附势者谄媚奉承的方式。当他们看到权贵策马来时,不管其马优劣如何,都会争着拍马屁股恭维一番。因此后世就视“拍马屁”为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同义词,贬义色彩甚浓。

### 初次见面出题为何叫“下马威”

“下马威”一词出自《汉书·叙传》,班固在为祖先作传时,记载伯祖父班伯因定襄时局混乱,而自请担任定襄太守,定襄豪民大户“畏其下车作威,吏民悚息”。意思是他们担心班伯初到任时要对下属显示威风,所以有所收敛。这里的下车,并非指从车上下来的动作,而是

## 人生至言

北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  
沈从文: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饭·芬奇:愿望,比愿

望的实现要美好得多。  
张伯苓: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郑渊洁:100分把童年变成100岁。

张爱玲:要想让别人在众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  
季羡林: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金克木:书读完了,摘自《今晚报》

## 名流故事

陈凯歌隔几天就会收到一封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件,虽然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但夫妻俩和两个儿子依然保持着用原始书信往来的习惯,而这些书信,也全都是毛笔写就。

## 陈凯歌一家的“行楷颜柳”

陈凯歌有个很特别的爱好——书法。陈红婚后得知他有这个爱好后,也相当支持,满北京城帮他淘换好的笔墨纸砚。

夫妇俩在江西的一处僻静处起了一座小洋楼,在陈红的打理下,三楼的整个楼面被全部打通,打造出了一间雅致古朴的书斋。

书斋门额上有一块横匾,上书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真趣”。这是陈凯歌有天跟陈红对酌到微醺的时候一时兴起,借着酒兴给书斋提下的匾额。后来酒醒了,反而写不出那种狂放随意的味道了,于是把这两个字好好装裱起来,安到了门额上。

那阵子陈凯歌正好比较闲,于是在书斋定居下来,很有点乐不思归。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凯歌在书斋流连忘返,陈红这个做太太的也经常上楼作陪。陈凯歌兴致高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点拨一二,这么一点拨,陈红也就慢慢上瘾,对书法不通竟有了粗通。慢慢地,写字时很多开头收尾的琐碎活都交给了陈红。

老看陈凯歌练字,陈红慢慢就受了影响,闲暇的时候,也会摊一张纸随心所欲地写写画画。没有陈凯歌那样的功底,陈红起先写的字有点惨不忍睹,陈凯歌看着陈红的“大作”,觉得脸上无光,索性就担任了陈红的书法老师,将自己多年的书法心得一一相授。

根据陈红腕力不足手劲不大捏不住大笔的

实际情况,陈凯歌最后帮太太确定了她练书法的主攻目标——蝇头小楷。陈凯歌自己比较偏爱用大楷笔,写字的风格也以端庄放为主,缺憾就是应付不了小楷字,写小楷是弱项。他觉得自己练不了的,正好适合太太练,将来夫妻俩双笔合璧,多般配。

陈凯歌专门托人从北京寄来一套碧云轩的蝇头小楷笔和一刀专练小楷的棉连宣纸。那阵子,两人可真是双宿双栖。在陈凯歌不遗余力的指点下,陈红很快就上道了,短短三个月,就能捏着极细的小楷笔写出黄豆大小的楷字。虽然距离蝇头还有点距离,但现在这个年代,在女艺人里,绝对是独一无二了。

陈红的小楷字越来越漂亮,于是就有了跟陈凯歌同纸献艺的资格。家里的亲戚们都巴不得弄几张陈凯歌写的中堂,所以陈凯歌用大楷写完以后,落款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红,陈红捏着小楷笔,娟秀地落上日期和“真趣书斋”几个字,陈凯歌再端正地盖上自己的书法专用印章。

后来拍摄《无极》的时候,片头的“无极”两个大字,就是陈凯歌的墨迹,而随后的演职员表,则是陈红一挥而就的作品。

随着儿子在美国长大,陈凯歌和陈红终于也在美国安下了自己的家。在美国买了房子后,新家自然也是必不可少要有个书斋的,只是,美国的书斋被设在了宽敞的地下室里。

在美国的书斋里陪陈凯歌的,除了陈红还有两个儿子。当两个儿子开始握着铅笔学习写英语单词的时候,陈凯歌给他们预备的小号毛笔也正式上岗——在陈凯歌看来,毛笔书法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陈凯歌给儿子们准备好了描红本,上面铺了很薄的白纸,让他们从描红入手。虽然只是最基本的发蒙描红,但陈凯歌的目光却早已放到了更远——给两个儿子的描红本是不一样的,雨昂临摹的是颜体,飞宇专攻的是柳体,家里四口人,行楷颜柳,各有所长,互补互益,这比起四个人的字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要有趣得多。

两个儿子慢慢练出了点模样后,每晚就有了新的集体活动。一家四口吃完晚饭,一起占一张书桌。陈凯歌随口吟出一首诗,于是便各自开始忙活。写完了,一字排开挂起来,大家坐在一起点评比较,挑出当晚公认写得最好的一幅保留下来,落选的其他三幅就塞进碎纸机。小孩子都是不服输的,为了尽可能多留留下自己的作品,一有空,不用陈凯歌监督,自己就主动去书斋练书法了。

儿子放假的时候,一家四口会在国内风景名胜的地并不不是什么名胜景区,而是一些最负盛名的笔墨纸砚产地。有关笔墨纸砚的故事充分激发了两个孩子对这些

古老玩意的兴趣,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去这些好东西的原产地,看看、瞧瞧、找找有没有最适合自己用的笔墨纸砚。

有一次,在肇庆市东部烂柯山的老坑、麻子坑和宋坑,两个儿子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搜索自己眼前的地面,不时在地上翻找挖掘,希望能翻出一块自己中意的砚石。虽然最后没什么大收获,只能遗憾地随手捡了两块普通的砚石,但经过当地匠人的一番雕琢后,一块做成了蝴蝶状,另一块做成了兰花状,两个儿子也爱得不得了,从此以后这两块砚台就成了他们的专宠,谁也不让动,视若拱璧。

就这样,书法从一种爱好变成了陈凯歌一家的生活习惯,跟吃饭一样,少了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梅兰芳》拍摄了十六个月,可就在这十六个月的繁忙中,每天晚上,在陈凯歌的房间里,夫妻俩依然会铺开一张好宣纸,合作写上一幅字,仍然是老规矩,陈凯歌写大楷,陈红补小楷。

在剧组,陈凯歌隔几天就会收到一封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件,虽然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但夫妻俩和两个儿子依然保持着用原始书信往来的习惯,而这些书信,也都是毛笔写就。夫妻俩共执一支朱笔,在儿子写得好的部位加上红圈,再给他们寄回去,当做是对书法作业的点评。

摘自《特区青年报》